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4.04.003

新质生产力、资源利用与企业组织韧性

李心茹¹, 田增瑞¹, 常培筌²

(1. 东华大学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200051;

2. 上海大学 上海企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 200444)

摘要:以技术创新为主导、以生产力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容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增加企业的可利用资源、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资源利用的收益共享,从而增强企业的高增长性和低波动性,即增强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11—2022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改进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样本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分析表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能够显著提升组织韧性,且既可以促进收入增长,又可以抑制收益波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非效率投资、促进共同富裕 3 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组织韧性;无论是组织韧性较强还是较弱的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都能显著提升组织韧性;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组织韧性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以新质生产力发展积累更多更优质的可利用资源、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促进收益共享和共同富裕,有效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

关键词:组织韧性;新质生产力;资源获取;资源利用效率;收益共享;融资约束;非效率投资

中图分类号:F270.7;F27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4)04-0035-15

引用格式:李心茹,田增瑞,常培筌.新质生产力、资源利用与企业组织韧性[J].西部论坛,2024,34(4):35-49.

LI Xin-ru, TIAN Zeng-ru, CHANG Bei-qua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J]. West Forum, 2024, 34(4): 35-49.

* 收稿日期:2024-04-08;修回日期:2024-06-28

作者简介:李心茹(1996),女,山东枣庄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研究;Tel:19101695596, E-mail:1229096@mail.dhu.edu.cn。田增瑞(1962),通信作者,女,河南新乡人;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创新创业与创业投资研究;Tel:13671963059, E-mail:13671963059@163.com。常培筌(1990),女,河南新乡人;研究员,博士(后),主要从事创新管理研究;Tel:13354490525, E-mail:113354490525@163.com。

一、引言

当前,大国博弈、大国竞争进入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在此背景下,我国高质量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因此,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企业是直接面对市场风险的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企业的组织韧性有助于提高其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组织韧性是组织预测潜在威胁、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并适应外部冲击、调节风险和不确定性影响的能力(Burnard et al., 2011)^[1],其通过重构组织资源、流程等手段,帮助组织顺利度过危机并实现逆势增长(吴晓波等, 2022)^[2],核心特征是成长的稳定性(王永贵等, 2020)^[3]。可以说,组织韧性是解释企业战胜危机并获得持续增长的最直接变量(梁林等, 2024)^[4],组织韧性强的企业能够在危机中迅速重构资源、流程和关系,以创新化解危机,以韧性战胜危机,促使企业迅速在危机中复原甚至逆势翻盘(周伟等, 2024)^[5]。因此,深入研究各种影响企业组织韧性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以有效促进企业组织韧性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韧性”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相关文献对企业组织韧性(或企业韧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集中于对企业内部因素的探讨。比如,较多文献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王强等, 2023;陈俊华等, 2023;张藹容等, 2023;罗良文等, 2024;高航等, 2024;沈馨怡等, 2024)^[6-11]、技术水平及创新(冯文娜等, 2022;贾勇等, 2023;章立等, 2023;冯挺等, 2023;王海花等, 2024)^[12-16]、社会责任及 ESG 表现(刘斌等, 2022;张思佳等, 2024;陈银娥等, 2024;刘建秋等, 2024)^[17-20]等对其组织韧性的影响。尽管如此,对于企业组织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依然有待拓展和深化。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新”与“质”:所谓“新”,是指新质生产力不仅会产生新的生产工具,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还会实现产业技术变革与生产要素的创新组合,构成新质态,创造新动能;所谓“质”,是强调将创新作为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实现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支撑的生产力跃升(林毅夫等, 2024)^[21]。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已有很多学者就其内涵特征、功能作用、发展路径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创新为主导,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生产力质态(金碚, 2024)^[22],能够带来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生产领域不断扩展、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生产韧性明显增强(罗必良, 2024)^[23],并推动异质要素流动融合,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徐政等, 2024)^[24],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张杰等, 2024)^[25]。因此,从理论上讲,宏观层面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有效增强经济韧性。然而,鲜有文献从微观层面深入探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企业组织韧性之间关系。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也开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和社会经济效应展开实证检验。其中,部分学者关注到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但还缺乏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影响企业组织韧性的经验分析。石玉堂等(2024)^[26]采用2010—2021年我国2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人才聚集效应、技术创新效应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宋跃刚

等(2024)^[27]采用2003—2020年154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显著增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曹晔(2024)^[28]采用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产业链韧性。王煜昊和马野青(2024)^[29]以2010—2022年我国837个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的供应链韧性。袁瀚坤和徐政(2024)^[30]采用2009—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通过降低协调沟通成本和运输库存成本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总体上看,当前对于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企业组织韧性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尤其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资源利用角度探讨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企业组织韧性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从组织韧性角度拓展和深化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并为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提升企业组织韧性提供了经验证据;二是分析并验证了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增加企业可利用资源、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资源利用收益共享来增强企业组织韧性的机制,有助于深入认识新质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三是借鉴相关研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改进,为客观科学地测量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作出了有益尝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组织韧性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由此可知,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意味着其员工的劳动能力和效率显著提高、技术水平和设备质量不断提升、产品结构服务质量持续升级,同时创新能力实现质的飞跃、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而这些都有助于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

企业组织韧性的关键表现在于产出和收益增长的稳定性,组织韧性强的企业通常同时具有高增长性和低波动性,不少实证研究也基于企业收入(或收益)的高增长性和低波动性两个维度来衡量企业的组织韧性。因此,本文主要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其高增长性和低波动性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论阐述。

一方面,从高增长性来看:高增长性意味着企业拥有足够的生产资源、较高的生产效率、持续扩大的消费市场,从而能够实现产出和收益的快速增长。要实现高增长,企业需要具有高生产效率和强创新能力,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恰恰就是通过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是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要素—技术—业态”的系统性重构,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胡芳等,2024)^[31]。因此,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将通过新质劳动者、新质

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的培育和引入及其组合的优化,在创新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无疑有利于企业产出和收益的增加。

另一方面,从低波动性来看:低波动性意味着企业在面临负面的外部冲击时,能够有效化解危机和风险,使自身的收益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要维持低波动,企业需要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以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寻求新的增长点,需要有合理灵活的生产要素配置以适应生产技术和消费市场的变化,还需要有高效的管理机制以及时制定和实施适宜的转型战略。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创新驱动是关键,生产力三要素的提质增效和组合优化是根本。因此,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就是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产出和收益的波动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1: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

2. 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资源利用机制

各种生产资源是企业维持日常经营活动以及进行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及其利用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发展状态。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当企业拥有充裕的可利用资源、资源利用效率较高、资源利用收益分配合理时,往往表现出良好稳定的发展态势。基于此,本文从资源利用的维度来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影响企业组织韧性的机制。具体而言,从可利用资源获取、资源利用效率、资源利用收益分配 3 个方面展开。

(1) 增加可利用资源路径。资源约束是阻碍企业组织韧性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企业因外部冲击而需要转型升级时,即使具有转型意愿和转型能力,也可能因缺乏转型资源而无法实现转型。因此,企业可利用资源的增加有助于其组织韧性的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资源获取增加效应。其一,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带来企业的绩效改善,向外界释放出积极信号,进而吸引外部资源(如人才、资金等)进入;其二,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拓展企业的可利用资源,比如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新的生产原料,或者从原有的资源中挖掘出新的利用价值^①;其三,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进一步以资本为例进行说明:资本是重要的能够带动其他要素流动的生产要素,但融资约束又是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当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时,资金仅能维持日常经营活动,难以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隐含的绿色转型和科技属性将提高企业的声誉和信用,使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总之,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增加企业的可利用资源,进而促进企业的组织韧性提升。

(2)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路径。企业的组织韧性与资源利用效率密切相关。一方面,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能够直接带来产出和收益的增长;另一方面,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也反映出企业的资源要素配置得到优化以及经营管理效率得以提升,而资源配置优化和管理效率提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风险应对和危机化解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会显著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本身就是企业可直接利用的资源,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的培育和引入将直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而技术进步是资源利用效率

^① 新质生产力提升具有生产边界拓宽效应,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对各类资源要素进行深层次的利用和挖掘,促使各资源要素的时空界限和生产可能性不断拓展,并通过对不同生产要素的创新组合创造出新的经济动能,进而突破传统的要素投入增长约束,推动各资源要素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蔡湘杰等,2024)^[32]。

提升的根本驱动力。同样以资本为例:资本错配导致的投资偏离最优状态是造成企业收益波动甚至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数智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数智化带来的信息改善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决策和资本配置的科学性(刘金钊等,2022)^[33];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不仅能够通过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三要素的跃升来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还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和资本配置。因此,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的组织韧性提升。

(3) 促进资源利用收益共享路径。企业组织韧性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发展状态,还受到其他经济主体的影响,尤其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组织韧性具有重要影响。外部冲击往往是普遍性的、共性的,在影响企业的同时也会对其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若企业能够与利益相关者责任与风险共担,共同应对危机与挑战,则可以更好地实现稳定增长。这需要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起互相协作的共生共赢关系,即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而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关键在于利益共享。因此,合理分配资源利用的收益,实现收益共享也是企业提升组织韧性的有效路径之一。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会促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共担。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协作,有助于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共生共赢的关系(柳学信等,2024)^[34]。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利益共享效应。出于合法性要求和社会责任,企业会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要促进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企业在响应政策号召,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必然更能理解、更加认同共同富裕理念,从而以利益为纽带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更加互惠的共生关系(侯冠宇等,2024)^[35]。因此,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其资源利用收益的共享,进而通过构建稳固的利益共同体提高企业抵御风险和化解危机的能力,促进企业的组织韧性提升。

综上所述,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增加可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资源利用收益共享3条路径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进一步基于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提出假说H2: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投资效率、促进共同富裕来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

三、实证检验设计

1. 基准模型构建

为检验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Res_{i,t} = \alpha_0 + \alpha_1 Npro_{i,t} + \alpha Controls_{i,t} + \delta_{year} + \gamma_{industry} + \varepsilon_{i,t}$$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被释变量($Res_{i,t}$)“组织韧性”为企业*i*在*t*年的组织韧性强度,核心解释变量($Npro_{i,t}$)“新质生产力”为企业*i*在*t*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Controls$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δ_{year} 和 $\gamma_{industry}$ 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对企业组织韧性的测度,本文参照吴晓波和冯潇雅(2022)^[2]的方法,从增长性和波动性两个维度构建企业组织韧性评价指标。其中,增长性以3年内累计增加的营业收入衡量,波动性以1年内各月股票收益的标准差衡量,采用熵权法计算得到“组织韧性”变量。

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本文借鉴宋佳等(2024)^[36]、张秀娥等(2024)^[37]的研究,并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对其评价指标进行综合和调整,构建如表1所示的企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熵值

法计算得到“新质生产力”变量。

表 1 企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方法	权重/%
新质劳动者	员工素质	研发人员占比	$(\text{研发人员数}/\text{员工数量})\times 100$	12.985
		高学历人员占比	$(\text{研究生以上人数}/\text{员工数量})\times 100$	8.855
	管理层素质	高管绿色认知	$\ln(\text{年报中绿色发展关键词词频}+1)$	6.320
		管理层海外背景	有高管具有海外背景取值为 1, 否则为 0	6.617
新质劳动对象	生态环境	环境治理得分	华证 ESG 评级的 E 指标, 9 个级别分别赋值 1~9	7.929
	未来发展	固定资产占比	$(\text{固定资产}/\text{资产总额})\times 100$	2.732
		资本积累率	$(\text{当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text{年初所有者权益})\times 100$	1.124
	科技劳动资料	创新水平	$\ln(\text{专利授权数量}+1)$	21.81
新质劳动资料	数字劳动资料	数字化程度	$\ln(\text{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词频}+1)$	4.62
		无形资产占比	$(\text{无形资产}/\text{资产总额})\times 100$	4.10
	绿色劳动资料	绿色技术水平	$\ln(\text{绿色专利授权数量}+1)$	9.96
		绿色专利占比	$(\text{绿色专利授权数量}/\text{专利授权数量})\times 100$	12.95

参考任广乾等(2024)^[38]、Lin 和 Fan(2024)^[39]的研究,本文选取以下 8 个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一是“资产负债率”,采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来衡量;二是“股权集中度”,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来衡量;三是“独立董事占比”,采用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总人数之比来衡量;四是“董事会规模”,采用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五是“两职合一”,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六是“四大事务所审计”,当年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七是“上市年限”,采用企业上市年龄加 1 后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八是“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取值为 1, 其他企业取值为 0。

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期间为 2011—2022 年,数据来源于 CSMAR、Wind 数据库。剔除金融行业样本、资不抵债样本、数据缺失样本以及 PT、ST、*ST 样本,最终得到 26 444 个观测值。对全部数据进行上下 1% 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VIF 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vif 值在 1.02~1.66 之间,表明本文选取的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组织韧性	26 444	0.891	0.053	0.901	0.071	0.974
新质生产力	26 444	11.118	5.432	10.870	1.427	26.718
资产负债率	26 444	0.398	0.194	0.390	0.027	0.902
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	26 444	34.106	14.729	32.032	8.020	75.843
独立董事占比(%)	26 444	37.653	5.354	36.360	27.270	60.000
董事会规模	26 444	2.118	0.196	2.197	1.609	2.708

续表 2

变 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两职合一	26 444	0.308	0.462	0	0	1
四大事务所审计	26 444	0.064	0.245	0	0	1
上市年限	26 444	1.949	0.803	2.079	0.000	3.401
产权性质	26 444	0.298	0.458	0	0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

基准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3。(1)列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2)列在(1)列的基础上控制了固定效应,(3)列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组织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说 H1 得到验证。进一步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企业组织韧性两个维度(增长性和波动性)的影响,结果见表 3 的(4)(5)列。“新质生产力”对“增长性”和“波动性”的回归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在促进企业收入增长的同时抑制了企业收益波动。可见,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强企业的高增长性和低波动性,从而促进企业组织韧性提升。

表 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1)	(2)	(3)	(4)	(5)
	组织韧性	组织韧性	组织韧性	增长性	波动性
新质生产力	0.695*** (11.691)	0.337*** (9.447)	0.204*** (5.663)	0.437*** (5.578)	-0.289*** (-3.927)
资产负债率			-0.010*** (-8.460)	0.007*** (6.108)	0.017*** (7.145)
股权集中度			0.000*** (9.112)	0.000** (2.515)	-0.000*** (-7.266)
独立董事占比			0.000 (0.717)	0.000** (2.467)	0.000 (0.152)
董事会规模			0.004*** (3.442)	0.004* (1.781)	-0.010*** (-3.824)
两职合一			-0.001* (-1.925)	0.001*** (3.304)	0.002** (2.281)
四大事务所审计			0.006*** (8.708)	0.019*** (8.777)	-0.010*** (-7.299)
上市年限			0.005*** (14.719)	0.003*** (4.384)	-0.012*** (-15.653)

续表 3

变 量	(1) 组织韧性	(2) 组织韧性	(3) 组织韧性	(4) 增长性	(5) 波动性
产权性质			0.001 ** (2.496)	-0.000 (-0.466)	-0.004 *** (-3.720)
常数项	0.883 *** (1 200.460)	0.877 *** (784.708)	0.856 *** (210.939)	-0.034 *** (-3.610)	0.172 *** (22.383)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6 444	26 444	26 444	26 444	26 444
Adj. R ²	0.005	0.667	0.676	0.036	0.212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t 值

2.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为缓解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 2SLS 检验。借鉴杨金玉等(2022)^[40]的研究,选取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与同年同行业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均值之差的三次方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工具变量。同一行业内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的外溢效应,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一定相关性,但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本企业的组织韧性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该变量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A。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偏 R² 为 0.468, F 检验值为 23 227.2(显著大于临界值 10),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拟合的“新质生产力”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缓解模型内生性问题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对组织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依然成立。

(2) 分样本检验。根据“组织韧性”变量的均值,将样本分为“韧性强”和“韧性弱”两组,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B。在两组样本中,“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参照曾贻和唐松(2023)^[41]的研究,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系数组间差异的显著性,结果显示 P 值为 0.084,表明两组样本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见,无论是组织韧性较强的企业,还是组织韧性较弱的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均能显著提升组织韧性。

(3) 替换解释变量。考虑到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本文借鉴张秀娥等(2024)^[37]的研究,采用 LP 法计算得到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C。“全要素生产率”对“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依旧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4) 更换聚类方法。在基准回归中,稳健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重新进行聚类到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回归,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D,与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调整后的 R² 也保持不变,再次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4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Panel A:工具变量法(2SLS)		Panel B:分样本检验		Panel C:	Panel D:更换聚类方法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韧性强	韧性弱	替换解释变量	行业聚类	城市聚类
	新质生产力	组织韧性	组织韧性	组织韧性	组织韧性	组织韧性	组织韧性
新质生产力		0.205*** (3.852)	0.086*** (3.992)	0.220*** (3.295)		0.204*** (3.936)	0.204*** (2.743)
工具变量	0.669*** (152.40)						
全要素生产率					0.131*** (7.251)		
常数项	0.002*** (4.851)	0.850*** (216.015)	0.893*** (405.445)	0.838*** (112.780)	0.852*** (208.026)	0.856*** (161.860)	0.856*** (196.1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6 444	26 444	16 224	10 220	26 444	26 444	26 444
Adj. R ²	0.530	0.672	0.676	0.453	0.677	0.676	0.676

3. 机制检验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42]的研究,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Res_{i,t} = \alpha_0 + \alpha_1 Npro_{i,t} + \alpha Controls_{i,t} + \delta_{year} + \gamma_{industry} + \varepsilon_{i,t}$$

$$M_{i,t} = \beta_0 + \beta_1 Npro_{i,t} + \beta Controls_{i,t} + \delta_{year} + \gamma_{industry} + \varepsilon_{i,t}$$

$$Res_{i,t} = \eta_0 + \eta_1 Npro_{i,t} + \eta_2 M_{i,t} + \eta Controls_{i,t} + \delta_{year} + \gamma_{industry} + \varepsilon_{i,t}$$

其中, M 代表中介变量。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选取以下3个中介变量:一是“融资约束”,借鉴姜付秀等(2016)^[43]的研究,采用KZ指数来衡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以此代表企业的资源约束,从而反向评估企业可利用资源的多少。二是“非效率投资”,参考Richardson(2006)^[44]、刘行和叶康涛(2013)^[45]的研究,构建企业投资效率模型,用模型残差值绝对值来衡量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从而反向评估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三是“共同富裕评分”,采用国泰安合作数据库之企业共同富裕数据库的企业共同富裕评分来衡量。企业共同富裕评分包含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多个层面的关键指标,从员工、顾客、股东、合作伙伴、税收贡献、公益慈善等方面反映企业在践行共同富裕理念方面的情况,能够体现企业资源利用收益的共享程度。机制检验结果见表5。

(1)从增加可利用资源路径来看:根据表5的Panel A,“新质生产力”对“融资约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即有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基准模型中加入“融资约束”变量后,“新质生产力”对“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但绝对值相比基准模型有所减小;同时“融资约束”对“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上述结果说明,融资约束在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组织韧性

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即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组织韧性提升。进一步采用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进行稳健性检验。Sobel 检验的 Z 值在 1% 的水平上显著,500 次随机 Bootstrap 检验的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不包含 0,均表明部分中介效应显著。由此可见,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增加其可利用的资源,进而增强企业组织韧性。

(2)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路径来看:根据表 5 的 Panel B,“新质生产力”对“非效率投资”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基准模型中加入“融资约束”变量后,“新质生产力”对“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同时“非效率投资”对“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减少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需要进一步采用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Sobel 检验的 Z 值为 3.551,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500 次随机 Bootstrap 检验的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为 [0.006,0.018],不包含 0。上述分析结果表明,非效率投资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减少非效率投资来促进企业组织韧性提升。由此可见,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提高其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增强企业组织韧性。

表 5 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基准回归	Panel A:缓解融资约束		Panel B:提高投资效率		Panel C:促进共同富裕	
	组织韧性	融资约束	组织韧性	非效率投资	组织韧性	共同富裕评分	组织韧性
新质生产力	0.204*** (5.663)	-9.799*** (-5.535)	0.192*** (5.320)	-0.001 (-0.017)	0.207*** (5.731)	0.521*** (20.470)	0.176*** (4.811)
融资约束			-0.002*** (-9.228)				
非效率投资					-0.024*** (-6.067)		
共同富裕评分							0.060*** (6.218)
常数项	0.856*** (210.939)	-0.173 (-0.918)	0.856*** (210.710)	0.066*** (10.600)	0.858*** (209.918)	-0.063*** (-25.800)	0.860*** (206.77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6 444	26 444	26 444	26 444	26 444	26 444	26 444
Adj. R ²	0.676	0.538	0.678	0.125	0.676	0.554	0.676
Sobel 检验		11.300***		3.551***		16.610***	
Bootstrap 检验		[0.107,0.152]		[0.006,0.018]		[0.211,0.264]	

(3)从促进资源利用收益共享路径来看:根据表 5 的 Panel C,“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评分”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共同富裕程度,即有利于企业资源利用收益的共享;基准模型中加入“共同富裕评分”变量后,“新质生产力”对“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但绝对值相比基准模型有所减小;同时“共同富裕评分”对“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共同富裕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上述结果说明,企业共同富裕程度在

新质生产力影响组织韧性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即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共同富裕程度来促进企业组织韧性提升。进一步采用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进行稳健性检验。Sobel 检验的 Z 值在 1% 的水平上显著,500 次随机 Bootstrap 检验的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不包含 0,均表明部分中介效应显著。由此可见,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其资源利用收益的共享,进而增强企业组织韧性。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假说 H2 得到验证。

4. 进一步的分析:异质性检验

不同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和组织韧性存在显著差异,而且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发展模式,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产生的经济效应可能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本文采用分组检验的方法,从企业的产权性质、规模以及所在地区等方面进行新质生产力影响组织韧性的异质性分析。

(1) 产权性质异质性。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的 Panel A。在“国有企业”组“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非国有企业”组“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显著增强了其组织韧性,但非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对其组织韧性的影响不显著。

(2) 企业规模异质性。根据同行业同年度企业年末总资产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两组,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的 Panel B。在“大型企业”组“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小企业”组“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大型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显著增强了其组织韧性,但中小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对其组织韧性的影响不显著。

表 6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Panel A:产权性质异质性		Panel B:企业规模异质性		Panel C:地区异质性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新质生产力	0.452*** (7.223)	0.041 (0.889)	0.297*** (6.265)	-0.079 (-1.336)	0.168*** (3.915)	0.431*** (4.249)	0.090 (0.920)
常数项	0.848*** (138.919)	0.871*** (157.711)	0.861*** (165.339)	0.875*** (133.320)	0.857*** (165.799)	0.851*** (81.601)	0.859*** (95.9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7 890	18 554	13 073	13 371	19 572	3 007	3 855
Adj. R ²	0.717	0.658	0.715	0.643	0.665	0.701	0.717

(3) 地区异质性。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3 组^①,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的 Panel C。在“东部地区”组和“中部地区”组“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西部地区”组“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显著增强了其组织韧性,但西部地区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对其组织韧性的影响不显著。

^①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总体来看,在样本期间,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组织韧性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机遇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挑战,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增强组织韧性。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为主导,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容,将增加企业的可利用资源,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资源利用的收益共享,从而增强企业的组织韧性,实现低波动的高增长。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2011—2022年数据分析发现: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组织韧性,且可以同时促进企业的收入增长和抑制企业的收益波动;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促进企业共同富裕来提升企业组织韧性;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组织韧性提升效应,在组织韧性较强和较弱的企业中均显著,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中显著,但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西部地区企业中不显著。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第一,企业要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驱动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的快速形成和优化组合。企业应重视技术创新,提高创新质量,坚持以创新为主导,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建立和完善以能力为底色、以贡献为标准、以公平为原则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积极性,优化技术创新环境;要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研究力度,提高技术创新质量;要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第二,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高企业资源获取能力,拓展企业可利用资源边界。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通过绩效提升增强外部资源获取能力的同时,还应积极开发新资源、深度挖掘资源利用价值,并通过技术创新和流程优化等促进资源节约,进而积累更多更优质的可利用资源。第三,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要充分借助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数智化红利,改善企业信息环境,提高企业决策效率,降低资源错配程度,并促进资源要素的创新组合,实现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推动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第四,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企业收益共享,提高企业共同富裕水平。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重视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联动效应,不仅要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本身的相互促进,还应通过利益共享机制培育和发展稳固的利益共同体,在增强组织韧性的同时促进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 BURNARD K, BHAMRA R. Organisational resilience: development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organisational respons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Taylor & Francis, 2011, 49(18): 5581-5599.
- [2] 吴晓波,冯潇雅. VUCA 情境下运营冗余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持续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J]. *系统管理学报*, 2022, 31(6): 1150-1161.
- [3] 王永贵,高佳. 新冠疫情冲击、经济韧性与中国高质量发展[J]. *经济管理*, 2020, 42(5): 5-17.
- [4] 梁林,段世玉. 越挫越强:持续打压下我国天生全球化企业组织韧性如何形成? ——基于 TikTok 应对美国封禁过程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 *管理评论*, 2024, 36(2): 273-288.
- [5] 周炜,海伦贝尔·李,宗佳妮. 企业战略变革影响组织韧性的效果与边界[J]. *科研管理*, 2024, 45(3): 105-112.
- [6] 王强,王哲璇,刘玉奇.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实现机理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23, 26(11): 58-80.
- [7] 陈俊华,郝书雅,易成. 数字化转型、破产风险与企业韧性[J]. *经济管理*, 2023, 45(8): 26-44.

- [8] 张蔼容,胡琬琪.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韧性提升吗?——资源配置的中介作用[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23,35(5):1-15.
- [9] 罗良文,张琳琳,王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证据[J]. 改革,2024(5):64-79.
- [10] 高航,周明生.数字化转型何以提升企业韧性——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技术应用情境的考察[J]. 科学管理研究,2024,42(3):53-65.
- [11] 沈馨怡,吴松强.数智化发展、双重网络嵌入与新创企业韧性——长三角中小集成电路企业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24,42(4):797-804.
- [12] 冯文娜,陈晗.二元式创新对高技术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知识范围与知识平衡的调节作用[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2,43(4):117-135.
- [13] 贾勇,傅倩汪琳,李冬妹.技术创新与企业韧性:基于新冠疫情情景[J]. 管理科学,2023,36(2):17-34.
- [14] 章立,王述勇.技术断供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6):102-114.
- [15] 冯挺,祝志勇.探索式创新与企业韧性——来自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45(2):116-126.
- [16] 王海花,李雅洁,樊燕燕.技术多元化、持续创新与企业韧性——双重网络的调节作用[J/OL]. 科技进步与对策,1-12(2024-03-2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20240325.1823.004.html>.
- [17] 刘斌,谭书琪.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韧性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多维实证分析[J]. 企业经济,2022,41(1):113-121.
- [18] 张思佳,贾明,张喆.利他型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韧性——以新冠疫情为外部冲击[J]. 软科学,2024,38(1):109-115.
- [19] 陈银娥,李春燕,谭欢,等.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4,45(2):128-135.
- [20] 刘建秋,徐雨露.ESG表现与企业韧性[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4,39(1):54-64.
- [21] 林毅夫,王贤青,黄奇帆,等.新质生产力[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
- [22] 金磊.论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经济学思维[J]. 西部论坛,2024,34(2):1-8.
- [23] 罗必良.论农业新质生产力[J]. 改革,2024(4):19-30.
- [24] 徐政,张姣玉.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价值指向与路径方向[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4):72-80+202.
- [25] 张杰,周艳菊,王宗润.新质生产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理论框架与路径研究[J/OL]. 当代经济管理,1-13(2024-06-2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240620.1735.002.html>.
- [26] 石玉堂,王晓丹,陈凯旋.新质生产力与城市经济韧性: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5(2024-06-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40626.1349.003.html>.
- [27] 宋跃刚,王紫琪.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5):29-42.
- [28] 曹晔.数字新质生产力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24,40(10):23-27.
- [29] 王煜昊,马野青.新质生产力、企业创新与供应链韧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J]. 新疆社会科学,2024(3):68-82+177.
- [30] 袁瀚坤,徐政.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OL]. 新疆社会科学,1-14(2024-05-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5.1211.F.20240521.1156.002.html>.
- [31] 胡芳,刘婷婷.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创新、升级难题与实践向度[J/OL]. 改革与战略,1-14(2024-06-2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5.1006.C.20240530.1402.002.html>.
- [32] 蔡湘杰,贺正楚.新质生产力何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效应的机理与检验[J/OL]. 当代经济管理,1-15(2024-05-1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240509.1637.009.html>.
- [33] 刘金钊,汪寿阳.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困境与对策探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37(10):1435-1444.
- [34] 柳学信,曹成梓,孔晓旭.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 版),2024,30(1):145-155.
- [35] 侯冠宇,张震宇.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现实路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3):93-100.
- [36] 宋佳,张金昌,潘艺. ESG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 当代经济管理,2024,46(6):1-11.
- [37] 张秀娥,王卫,于泳波. 数智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OL]. 科学学研究,1-19(2024-05-21). <https://doi.org/10.16192/j.cnki.1003-2053.20240518.003>.
- [38] 任广乾,赵梦洁,李俊超. 逆向混改何以影响民营企业韧性——基于董事关系网络的视角[J]. 财经科学,2023(5):92-110.
- [39] LIN J B,FAN Y C. Seeking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through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examining the role of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usag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24,198:123026.
- [40] 杨金玉,彭秋萍,葛震霆. 数字化转型的客户传染效应——供应商创新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22(8):156-174.
- [41] 曾增,唐松. 新冠疫情下国有企业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基于供应链扶持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23,58(3):78-96.
- [42]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 [43] 姜付秀,石贝贝,马云飙. 信息发布者的财务经历与企业融资约束[J]. 经济研究,2016,51(6):83-97.
- [44] 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2-3):159-189.
- [45] 刘行,叶康涛. 企业的避税活动会影响投资效率吗? [J]. 会计研究,2013(6):47-53+96.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LI Xin-ru¹, TIAN Zeng-rui¹, CHANG Bei-quan²

(1. *Glorious S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2. *SHU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 inherent demand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echnology has given ris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built on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with high-tech, high-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features, which are in line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the overall deterioration in geopolitics and the decline in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has deteriorated again, facing a series of new challenges and crises. Therefore,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improv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economic security. However,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underst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how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improv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remains to be explored.

The article select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with data sourced from CSMAR and Wind databases. Based on the modifie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odel by Zhang Xiu'e et al. (2024), it quantitatively assesses each company's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xamines its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nhanc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primarily involve increasing resource acquisition,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roving resource sharing.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including variable substitution,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s, and cluster substitution method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remain robust.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s more pronounced in sampl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nd large-scale enterprise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firstly, based on the improve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Song Jia, Zhang Xiu'e et al., it explor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a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focuses o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how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ork, and enriches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econdly, it examines the impa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the organizational toughness of enterprises and develops the analysis of the role channel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organizational toughnes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creasing resource acquisition, optimiz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roving resource sharing; thirdly, we further analyze the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s in enterprise attributes,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scale differences, etc. on the impa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organizational toughness, so as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and support for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study in this article reveals to some extent the internal logic of how the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enterprises influences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t not only helps enterprises to prioritiz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mote the smooth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but also drive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construct a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frame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design diversified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procedural norms for different regions,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source acquisition;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revenue shar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efficient investment

CLC number: F270.7; F273.1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4)04-0035-15

(编辑:刘仁芳;夏冬)